

##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s Desk

### 从文化相遇的视角看基督教今日在华的主要挑战和机遇<sup>①</sup>

黄保罗

(吉林大学欧亚特聘讲座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从文化相遇的视角,探讨基督教在 21 世纪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所遇到的挑战,我们需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笔者把这些挑战归纳为三大类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将直接关系到基督教在华的生存、发展及对中国的贡献。<sup>②</sup>

第一个挑战和机遇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要求基督宗教在汉语语境中首先必须面对和处理政治问题,否则,基督教的生存与发展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基督徒应该如何处理?

一方面需要从中国的政治神哲学本质着眼。中国政治神哲学的本质要求,所有的宗教、哲学与文化主要承担两方面的功能:一为现有政权的合理性提供论证,二为现有政权的稳定性提供帮助。从现实的层面看,汉语学术神学家需要处理基督宗教与无神论极左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sup>③</sup>从历史的层面,汉语学术神学家需要处理三个问题。首先是从 1840 鸦片战争以来到 1950 年代抗美援朝之间基督宗教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在中国人民和政府心目中留下的消极影响。<sup>④</sup>其次是 21 世纪中期以来至今仍然使中国政府无法放心的西方对华渗透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这二者直接关系到基督宗教的在华表现和被接受度。基督徒需要从历史事实的视角梳理清楚基督教与这些主义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被误解的地方要用学术的方式指出来以正视听,<sup>⑤</sup>有错误的地方要勇于道歉和改正,努力消除掉政权的担心。三则基督宗教需要谨慎处理与儒家相遇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随时有可能被民粹主义绑架而变成政治问题。2010 年曲阜建基督教堂遭到部分儒家人士反对的事例就可说明这个问题。<sup>⑥</sup>

另一方面,需要从基督宗教的神哲学本质着眼。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汉语学术神学家需要在教义的层面处理基督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就基督宗教的神哲学本质而言,它既不只是为了对现有的政权

① 此部分内容提炼于拙文,黄保罗 2012:“21 世纪汉语语境中成熟层面的汉语学术神学之构建”,中国神学论坛第五届研讨会 2012 年 8 月 22-24 日 美国波士顿戈登·康维尔神学院“基督教信仰与 21 世纪的中国 Christianity and 21<sup>st</sup> Century China Conference”。

② 有人从政治、文化及教会本身与基督宗教中国化的核心和难点之所在。参考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单仲雪 2012:“基督宗教中国化的难点及建议”,载《中国民族报》,2012-04-17。

③ 近年来有一批极左的无神论者,不同于当前政府的改革、开放与和谐政策,拒地理性和客观分析,抛开学术层面地分析,从政治视角入手,将自由主义和外来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视为威胁中国的政治的敌对势力并鼓励政府进行排斥。不但批评国外的基督宗教而且批评国内学术界对之进行的宗教学研究。

④ 黄保罗 2011:“全球化下基督教对中国形象之塑造的影响”,载李灵、曾庆的主编《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页 82-83。

⑤ 陈才俊教授关于传教与鸦片贸易的研究,根据历史史料澄清了许多谬误。参见陈才俊 2012:“英国传教士对晚清鸦片贸易的态度与行动”,载《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第 2 期,页 91-106。

⑥ 在 2010 年 12 月 22 日由部分儒家学者发出“尊重中华文化圣地,修建曲阜耶稣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稣教堂的意见书”。笔者撰文评论,见黄保罗 2011:《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儒家报第 170 期;此后有部分学者回应和批评拙文,见魏星 2011:《对〈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的回应》,儒家报第 170 期;孙敬涛 2012:《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一文存在的漏洞》,儒家报第 170 期,页 75-83。

合理性进行论证和诠释,也不仅仅是为了对现有政治权力的稳定性提供维护。基督宗教除去对上帝忠诚之外,绝不应该简单地依附于任何政治理念、政治实体或政治权力。但基督宗教在中国是进行百载了当地先知性批判、甘愿冒险被掌权者直接消灭或被民粹主义误解与曲解?还是坚持真理却又“灵巧象蛇”般地处理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呢?若处理不好,信徒或者会被戴上基督宗教教义本身所部主张的“在属世国度争取革命”的帽子而给教会带来灾难性打击,或者被政权彻底驯服而失去了先知的批判性,如二战时纳粹德国的官方教会。需要客观地指出,从教义本身而言,基督宗教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进行“革命”与“夺权”的使命,顺服掌权者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责任(罗马书13:1-7、提前2:1-2、提多书3:1都有论述)。因此,基督宗教信仰与政治并不一定总是冲突的,其间有很大的缓冲与合作余地,双方需要带智慧来处理它们关系,二者之间并非没有灵巧处理的可能性。

第二个挑战和机遇是,从处境神学与文化相遇的视角,基督宗教必须处理好与中国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处境神学、文化相遇与文化主体性三个概念。

所谓处境神学(contextual theology),<sup>⑦</sup>是在特定处境中依据福音的能力来回应该语境之挑战的神学,它与让神学适应于某个文化传统形式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努力密切相关。就处境神学的概念而言,基督教在华需要构建汉语学术神学;这是汉语语境中的基督宗教神学,其中心词是“神学”,而“汉语学术”只是起修饰作用的定语。这种神学的核心是要以合适的方式在汉语语境中把基督宗教信仰的本质以理性言说、情感表达和神秘体验等完整性的方式表述出来而被该语境中的受众所认识和接受。

所谓“文化相遇”(encounter of cultures)则表示两种或更多文化的相遇,其中特别需要关注随之产生的排斥(exclusivism)、包容(inclusivism)、多元(pluralism)和个殊主义(particularism)<sup>⑧</sup>等处理方式。就汉语学术神学的构建而言,在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汉语语境中,基督宗教应如何处理与之相遇的“中冀”之儒、道、民间宗教等元素,是采取完全或部分地排斥和包容的处理方式,还是主张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多元并蓄,抑或是不重在“破”而在“立”地阐述自己独特之处的个殊主义,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审慎选择的。

所谓“文化主体性”是指一种文化之所以成为某种文化的不可改变的本质特性。若非天启神学的立场把某种文化视为上帝启示的话,从人文主义的视角而言,每种文化的本质主体性都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因此,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每种文化模式的发展,又总受到内在和外在双重推动力的影响,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传统要进行“先知式”的批判继承,另一方面要对外来文化传统进行积极地借鉴和吸收。缺少这两方面的批判和吸收,一个文化模式就会僵化而无法适应新语境所提出的挑战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严格来说,人文主义无法产生出“绝对坚持自己的主体性”立场,因为只有神启传统才会产生宣称自己的主体性是绝对正确的可能。但是,以部分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代表者,在处理如何与基督宗教相遇时,会产生理论与实践中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以人文主义对一

⑦ Stephen B. Bevans 提到处境神学(contextual theology)有五类:翻译模式(translation model)、人类学模式(anthropological model)、实践模式(praxis model)、会通模式(synthetic model)、超越模式(transcendental model)。参阅 Bevans, Stephen B. 1992: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纽约 Maryknoll: Orbis Books 出版社,页3,10。“处境神学”一词是非常新的提法,但是关于福音与文化的争论却是长期以来的持久现象。参考 Ahonen, Riitta A. 2003: La hetya rajojen ylittäminen. Kokonaisuutenaisten lähetyskäytöksen vaikutus lähetystyön rakenteeseen. Kirkon tutkimuskeskuksen julkaisuja 84. Jyväskylä: Gummerus; 页29。中国神学家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神学本色化(indigenization):如何调和福音与传统文化的形式。参考 Kena, Kirsti 1993 Kankoiden teologian näkökulmia, STKSJ 181, 赫尔辛基; 页12; 杨慧林与史晓丽 2004,《汉语神学的处境化及其问题领域》,载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2004,22/ 234。也可参考王晓倩 1998《基督教与帝制文化》(Christianity and Imperial Culture: Chinese Christian Apologe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Latin Patristic Equivalent), 荷兰莱顿: Brill 出版社。

⑧ 黄保罗 2012:《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北京:民族出版社,页158-177。

切文化主体绝对性的拒绝来拒绝基督教的主体绝对性,另一方面却又以文化主体性为由来为儒家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及其绝对性进行辩护。

为了探讨如何从处境神学与文化相遇的视角处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索隐神学<sup>①</sup>和曲阜建教堂问题<sup>②</sup>为例展开论述。

第三个挑战和机遇是,从人文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的视角,基督宗教必须处理好在入世层面上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为芸芸众生可能不关心政治与文化,却很少有人不关心世俗的利益。<sup>③</sup>为此,笔者提出下列视角:

首先,基督宗教有可能帮助中国克服资本主义私欲野马和官僚主义利维坦的消极影响。就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发展而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私人利益的驱动下,疯狂奔驰,积极地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资本主义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一旦它与基督宗教相结合就能为人类带来无限的祝福,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与基督新教伦理相遇而对现代欧美社会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性,马克斯韦伯有过非常深刻而影响重大的论述。<sup>④</sup>可一旦与自私的人文主义结合就会产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为人类带来无限的灾难。基督宗教对资本主义的约束和驾驭能力,是它西方被社会所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儒家文化的本质似乎很难承担起驯服或驾驭资本主义的重担。<sup>⑤</sup>今天,应该积极地论证基督宗教如何与资本主义特别是市场经济相结合,克服其短处,发扬其长处,一方面克服资本主义自私野马的盲目性可能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伤害,另一方面克服官僚主义利维坦破坏经济发展或腐化社会的消极影响,基督宗教能在世俗和实用的层面为中国社会造福。

其次,基督宗教有可能帮助中国克服人文主义“众意”民主的消极影响。就社会制度和法规而言,欧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在于廉洁为民的政府与法制缰绳和笼子对资本主义与利维坦的束缚。基督宗教既主张一切权力来自上帝而教导信徒顺服掌权者,而又拒绝任何政府的完美性,使之永远在上帝的监督之下。在基督宗教传统中,先是如霍布斯所云,拥有绝对权威的政府象利维坦一样,能够保护公民,但会因其自私性也会残害人民。<sup>⑥</sup>后经洛克和卢梭<sup>⑦</sup>等人发展起来的“公意”民主法制,成了套住资本主义野马或象脱缰的缰绳、与管制利维坦这个怪物或象疯狂伤人的笼子,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可是,法制只能套住资本主义野马的身体却套不住其灵魂,只能管辖利维坦这个怪物的身体却管不住其内心,因此,法治对经济和社会秩序之维持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主法制与基督宗教分离而只依靠人文主义的理性时,本来按照超越的真理而寻求“公意”的民

<sup>①</sup> 该处文字和核心思想主要引自拙文,见黄保罗 2010,《论索隐神学——对法国耶稣会上境讲利玛窦之后文明对话的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T》2010年第1期,页1—10。

<sup>②</sup> 在2010年12月22日由部分儒家学者发出“尊重中华文化圣地,修建曲阜耶稣教堂——关于曲阜建耶稣教堂的意见书”。笔者撰文评论,见黄保罗 2011,《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同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儒家论坛第170期;此后有部分学者回向和批评拙文,见韩晨 2011,《对〈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同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的回应》,儒家论坛第170期;孙铁研 2012,《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同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一文存在的问题,儒家论坛第170期,页75—83。

<sup>③</sup> 此部分内容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黄保罗 2012,“基督宗教信仰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发表于2012年11月2—4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论坛 2012”(Beijing Forum 2012: The Harmony of Civilizations and Prosperity for All Panel (Session II Faith and Society: Spiritual Reflections of Global Age))。黄保罗 2012,“从新汉学视角来看基督宗教信仰对于中国社会秩序的意义”,发表于2012年11月3—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Sinology Conference 2012)。

<sup>④</sup> 韦伯著、陈平译 2007,《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西安: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见“编者序”,页8—9。

<sup>⑤</sup> 韦伯著、陈平译 2007,《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西安: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页21—27。

<sup>⑥</sup> 霍布斯著、黎思复与黎廷诤译 1985,《利维坦》,商务印书馆。赵敦华 2001,《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208—209。

<sup>⑦</sup> 洛克著、叶启芳等译 1963,《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页57—58。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编 198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页72。赵敦华 2001,《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252,281—283。

上法制,就会变成完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粹主义的“众意”,只论人数多少,不问符合真理与否。<sup>97</sup>这是欧美社会在制度与物质层面稳定而在精神与心灵层面空虚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此可见,民主与法制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当它与基督宗教结合时,其民粹式的“众意”就可能被控制为符合真理的“公意”,因而在制度层面它可能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和平转换的模式。当民主制度脱离基督宗教和对公意的追求而只顾自己的私利与众意时,就会与暴力结合,走向民粹主义的鼓动宣传和单纯靠少数服从多数的“点人头票数”的模式,很难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和平的转换模式,难以逃脱“改朝换代”的破坏性模式。<sup>98</sup>

第三,基督宗教有可能帮助中国从狭隘主义的“民族国家”重返开放化的“天下”提供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就精神层面而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超越的灵性维度。基督宗教经历了诞生之初被打压、成为国教一统天下、受到人文主义(特别是理性与科学)的挑战而被限制在私人领域等不同阶段之命运以后,在当代的欧美社会,它变成了救心丸一样的东西,平时不一定被重视,危机关头却被用来救命。这颗救心丸的核心——上帝信仰,作为狭隘人文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对立者,对于野马与利维坦的疯狂性和绳索与笼子的局限性,都能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值得汉语学界思考借鉴。<sup>99</sup>为了避免社会达尔文主义野马的侵略性、人文理性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危险,儒家文化的发展有必要探讨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基督徒有必要建议儒家人士深刻地挖掘儒家传统中的“天”之超越维度,并积极改变儒家的固有之“天下”概念被近代逐渐压缩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狭隘概念的现状,<sup>100</sup>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进行形而上层面的超越性论证,并为其发展提供蓝图与方案。

总而言之,从基督教的形而上超越性来处理人文主义(包括理性主义狭隘科学)的误区和主体性之缺陷,从而获得能力面对后现代解构而引起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基督宗教可以在华积极发挥影响的领域。

本期国学、西学与神学栏目发表了牛津学院院长汉科克博士的“社会模型:信仰、形式与政治的想像力”,与北京大学宗教文化学院院长张志刚教授的“共建和谐世界的中国文化资源”。前文探讨了信仰、形式与政治想像力作为社会模型的影响力,后文探讨了中国前辈学者探索和谐世界的成果评述。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栏目收录了“中芬天使学术论文学奖”第一届二等奖获得者武汉大学韩晴博士的“电子媒介、大学生活与基督教传播”一文,与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黄剑波教授的“合法性问题与地方基督教的生成”。前文以湖北乙大校内“基督教传播方式”为对象调查分析了新媒体对于基督教传播的影响,后文以一个中国西北内陆教会为例,探讨地方性教会是如何在寻求生存合法性和信仰合法性的互动过程中得以生成。中西经典与圣经收录了美国世华研究中心主席戴德理博士的“保罗以弗所书中和谐社会的根基”与陕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马尔梅博士的“缓华语而别赋新义”。前文探讨了《以弗所书》思想对于和谐社会观念的影响,后文以基督教概念“公义”为例探讨了它与和谐理念之间的关系。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收录了德国著名差传学专家柯兰冕教授的“得救还

<sup>97</sup> 卢梭论公意与众意的区别参见赵敦华 2001:《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 282—283。

<sup>98</sup> 以法律为例,“法律必须被信仰”,它才欲被人尊重和遵守,否则法制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参见哈罗德·伯特曼著,梁治平译 1991:《法律与宗教》,二联书店。

<sup>99</sup> 参考贾保罗 2012:“基督宗教信仰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将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发表于第 8 届北京论坛)。

<sup>100</sup> 孙向晨 2010:“西学视野下儒学现代转型应有的几个维度”,载张志刚、产华主编 2010:《信仰与责任——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反思》,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页 270—271。姚大力 2006:“‘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10 期;吴增定 2005:“从‘国家’重返‘天下’: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当代意义”,载《文明的和解——中国和丫喇阿以后的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

<sup>101</sup>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书本华意志,弗洛伊德梦中,马克思实践都是以人的主体性建构为根本的。

是定罪?”与华东师范大学年轻学者褚谦白博士的“另类的基督教”,前文从宗隐神学角度利用大量以前没有出版过的资料探讨了马斯格雷利在礼仪之争(1701)中的“辩护”,后文从“天兄”耶稣形象探讨了“拜上帝教”的民间信仰特质。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收录了武汉大学教授周玄毅博士的“儒耶文化适应性比较初探”与湖北大学康志杰教授的“天主教贞女与基督新教单身女传道”,前文是作者根据其2011年在首届“国学与西学北欧论坛”上发表的演讲修订而成的论文,后文主要对两种基督宗教独身女性进行了比较研究。书评与通讯部分,本刊编辑部与赫尔辛基大学合作,对第十二届国际路德研究学会的会议进行了综述报道,这是五年一次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路德研究会,本次会议促使了世界华人路德学会的诞生,对于汉语世界对路德的研究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杨林雁博士的书评对谈李向平教授的《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进行了“信仰社会学”的新视角解读。清华大学教授朱东华博士的“斯文谁复念公善”对桑德尔的《公共哲学》进行了评述。

2012年10月10日于赫尔辛基

**English Titl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hristianit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China**

**Paulos HUANG**

Ph. D. & Th. 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ost-doctor, Tokyo University

Kuang Yaming Distinguished Chair - Professor, Jilin University, 130012 Changchun, Jilin, China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Adjunct -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Helsinki

Email: paulos.z.huang@gmail.com